

# 重思物質與生命

## ——評張君玫《後殖民的人類世：生命的展演政治》

●張劭穎

如果想要理解近年人文社會科學的後人文主義、新物質主義、本體論轉向、政治生態學等一系列前沿研究，張君玫的《後殖民的人類世》值得一讀。本書的文本初看有如概念萬花筒，呈現了作者有關人類世背景下「生命的展演政治」的圖景。



張君玫：《後殖民的人類世：生命的展演政治》（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23）。

如果想要理解近年人文社會科學的後人文主義(posthumanism)①、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②、本體論轉向(ontological turn)③、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④等

一系列前沿研究，台灣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君玫的《後殖民的人類世：生命的展演政治》（以下簡稱《後殖民的人類世》，引用只註頁碼）值得一讀。這本書不是一本教科書式的理論科普，也不是一般社會科學範式的梳理綜述，而是以流動又迂迴往復的語言，展現作者藉由相關理論和概念所做的稠密思考。繁複意象、新興概念加上科技語彙，以及詞藻微妙的語義辨析，加之從英文到中文的術語翻譯，本書的文本初看有如概念萬花筒。然而，對於理解後人類等理論，這正是恰如其分的表達。讀者如可以懸置某種既成的視角和思維，以開放的方式跟隨作者思索，便可穿越修辭的迷霧，深入新物質主義、本體論轉向等理論的思想腹地。

作為作者「後殖民」系列的第三部著作，本書從「陰性情境之語文」（第一部）、「賽伯格理論之批判」（第二部）來到了有關生命之理論的書寫⑤。本書試圖探索的命題是：在

後殖民、「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框架下，如何對「物質」與「生命」展開新的理解？基於這一系列的理解，新的生命政治又何以可能？在本書的五個章節中，作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反覆回應了這一命題。在第一章有關人類世的導言之後，第二章從「界限」及「越界」出發，思考「生態」的意義；第三章聚焦「後殖民」的概念及其多重意涵；第四章以「蓋婭」為核心命題，探討情動政治的倫理和潛能；第五章在「病毒世」(Virocene)的語境下思考生命的複雜意義。五個角度的論述圍繞不同的關鍵概念、意象展開，又相互交疊、呼應、拼補，共同呈現了作者有關人類世背景下「生命的展演政治」的圖景。

本書的概念和意象相當繁複，集結諸多重要概念和核心語彙。其中反覆提及的概念至少包括：後殖民、人類世、蓋婭、行星、生態、生命、生命政治、分子、尺度/尺度縮放、時空、地景、軌迹、界限、纏繞、繞射、塗鴉、迴圈、化成、物種、物質、演化、遺傳、代謝、免疫、病毒、共生、共構、重組、網絡、航圖、情動、異質/差異/多元/多樣性、非線性，等等。對於不熟悉相關領域的讀者來說，可能構成相當的障礙。需要理解的是，作者的修辭方法，恰是為了不被語言限制而落入慣性的思維陷阱，太快進入我們已經過於熟悉而未經反思的範式。要把握這些概念，首先需要將它們置於作者試圖思考並對話的脈絡當中，即她所提議的一種看待生命與物質的視角轉化，並基於此對地球上生命和物質

展開重新想像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概念並非彼此獨立，而是互相關聯、映照、呼應，並且可以互相解釋的，因此可以視為「概念叢」或者概念的「星系」，並置而加以理解。下文就採用這樣的一種方式，通過對於「概念叢」的解讀，對本書進行梳理和評議。

## 一 以分子為鏡，重現地景

在本書中，作者邀請我們採取一種「分子」的視角重新看待世界萬物及生命現象。分子的視角不難理解，即「看見」或者想像，物質是由不同尺度、不同單位上的微觀顆粒動態組合而成。物的最小單位可能細分至分子，更可能小於分子（如本書使用的「次分子」等更小的尺度）。分子理論以及相關諸多微觀粒子理論，乃至今天的分子生物學，其實來自從古代哲學到現代科學的對於世界之本質的理解企圖。不過，作者在此重提分子，對於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來說確實頗具新意。她試圖指出的是，分子為我們提供了看待、分析事物的不同角度。更具體地說，是不同於啟蒙運動以降的，佔主導地位的對於「人—物」、「身—心」的二元切分，以及以「個體之人」作為固態分析單位之理性視角。例如，換個眼光看，一個個體之人或動物未必是一個獨立的生命單位，更未必是一個行動單元。無論是從細胞、組織還是從細菌、病毒及其集群和交換來看，都可見大為不同的生命景觀。

作者援用大量最新自然科學研究的例證，試圖傳達的信息是，生命在何層次上突生，以及生命在不同層次展現的不同現象和活動，仍是當代科學不斷探索的課題。人文社會科學沒有理由抱守唯一一種對於個體、生命、行動者的固理解。

採取「跨界」的視角，是本書的一個關鍵提議。作者提出需要被反思、跨越並解構的界限包括但不限於：自然與社會、人與其他物種、生命與非生命之間的界限等。其中特別強調的是對於「自然—社會」的跨界，以及多物種間的跨界。

作者援用大量最新自然科學研究的例證，試圖傳達的信息是，生命在何層次上突生，以及生命在不同層次展現的不同現象和活動，仍是當代科學不斷探索的課題。既然科學本身仍在爭議中不斷發展，那麼人文社會科學也沒有理由抱守唯一的一種對於個體、生命、行動者的固化理解。這種視角只是諸多理解「物」的眼光之一，而且很可能已經限制了我們對於當今諸多生態環境—生物社會問題的分析方法和想像能力。

書中指出分子轉向的前提是對「尺度」概念的重新關注。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概念包括「尺度」、「尺度縮放」，再到「界限」、「越界」等。「尺度」是近年生態環境研究的一個關鍵概念，一般涉及觀察、分析或敘事的尺度。例如，對於某一生態問題（如碳排放）的探查，會因為分析尺度的縮放和界限的劃定而具有現實的差異。事實上，人文社會科學對於可研究議題的識別和界定往往取決於分析尺度的選取。當然，尺度本身也是在不同的認識論框架下和知識脈絡中被製造出來的。儘管以往的研究往往不關照尺度，但這不意味着沒有尺度，只是所採取的某種尺度往往是無意為之且未加反思的。

一般而言，尺度針對「時空」和「規模」，微觀至分子、病毒等微粒；宏觀至區域乃至全球生態圈。尺度幫助我們重獲對於物和生命的理解與想像能力。例如，將目光微縮至分子尺度，「病毒」、「DNA」就進入了分析視野。如果時間軸被拉長，遺傳、交配和物種演化等現

象就加入了現實的動態圖景。如果再對空間尺度拓展，「地景」、「環境」乃至「生態」就構成了分析對象。如果把時空尺度放得足夠大，即時間上以地質年代為軸、空間上以地球/行星為框架，「人類世」的概念就呼之欲出（下詳）。關鍵在於，宏觀和微觀、大與小，本身也並非固化的二元。地球的生命、生態的展開，可能是穿越於、流動於、集結於多重尺度上的現象。

「界限」與「跨界」亦是本書所作討論的概念起點。事實上，「界限」概念早在本世紀初就被社會學家提出。在以往的社會學研究當中，使用界限可分析的現象包括：集體認同；階層、種族和性別的劃分；職業、科學和知識的劃分；社區、國家和空間的分界<sup>⑥</sup>。在新物質主義的脈絡中和政治生態研究中，「界限」以及相關的「越界」概念重獲潛力。在生態分析中，界限往往涉及「閾限」、「極限」等概念，意味着一種「倒推」的視角，即地球可容忍（達至災難性後果）的限度。碳排放等指標正是基於「閾限」而被提出的，即為了避免災難性後果而對未來人類的行動設限。此外，使用「界限」概念，我們可以審視分析的對象單位、行動者的單元，打開封裝、包裹其外部的固化邊界，並對個體、群體的流變加以體認，在辨析界限的同時審視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的越界現象。

首先，採取「跨界」的視角，是本書的一個關鍵提議，「我們必須審慎面對並進行界線的辨認、協商、承認、交換和轉化」（頁104）。作者提出需要被反思、跨越並解構

的界限包括但不限於：自然與社會、人與其他物種、社會性別、觀測尺度、物質與符號、生命與非生命之間的界限。其中特別強調的是對於「自然—社會」的跨界，以及多物種間的跨界。其次，需要注意多界限展露、消除、重構的關係性、動態性與過程性，並在此基礎上重新理解「生態」的意義：「橫切社會和自然虛構界線的、生命之所繫的分子連結、重構及纏繞的過程，亦即新陳代謝的複雜網絡。」（頁81）最後，還要關注界限流動變化本身的政治意義，「我們必須探問是誰/甚麼在付出怎樣的代價」（頁104）。

今天全球人、物、信息、微生物高度流動伴隨着大流行病的發生和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模式的興起，人類學研究者追蹤並探究疫情背景下人與非人、不同群體、人與自然之間的各種界限被不斷重構的現象。這些經驗研究呼應了張君攻對於跨界之視角的提議。例如，近年諸多疫病的發生被認為是人與野生動物的不當接觸交叉感染所致，對病毒的溯源涉及了人群之間、人與動物、養殖與野生的界限之重新劃定，乃至公共衛生科研模型的重構<sup>⑦</sup>。而對病毒的控制，則涉及了個人、群體、國家之間的界限協商，公共衛生工作本身就是一個多重界限劃定的實踐。疫病防控工作的目的在於通過劃界阻止病毒跨越界限流動，隔離即是對於潛在的病毒攜帶者劃定物理界限。以世界衛生組織（WHO）為首的全球公共衛生系統旨在消除國家之間的隔膜，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

出發共同對抗病毒的傳播，但其工作的效果有時卻是建立甚至加深而不是消除成員國之間的界線<sup>⑧</sup>。總之，關於不同的界限是否應該維繫、如何維繫、何種程度才是恰切等一系列問題，也在全球流行疫病的衝擊下被研究者不斷地探討和追問。

## 二 透過病毒，再理解活物與生命

在本書中，作者採用了「病毒世」這一概念來表述「病毒」的重要意義。病毒成「世」並非危言聳聽。首先，電子顯微鏡讓病毒這種與人類始終相互伴生、共同演化的微生物浮出水面，被人類所「看見」，從而改寫人類的知識和觀念。其次，如前文所述，伴隨全球化的高度流動、跨界活動，人類的社會歷史乃至生命政治已被病毒深刻影響。事實上，人類學家對於病毒的隱喻及其回饋乃至建構的全球疾病監控系統早有關注，提出「病毒博物館」、「獵人」、「崗哨」等意象，來理解基於病毒觀念的全球疾病—衛生治理模式<sup>⑨</sup>。最後，作者意欲強調且著墨更多的一個方面，即在分子尺度上，病毒給我們對於生命的理解所帶來的衝擊。書中援引大量分子尺度上病毒研究的進展，藉以說明科學對於病毒的研究不斷更新着生命的概念本身。

具體而言，病毒的信息傳遞與複製策略、遷移與演化軌迹、寄生與共生模式，無不揭示生命本身的複雜性。在這個過程中，不僅病毒

作者採用了「病毒世」概念來表述「病毒」的重要意義。她意欲強調且著墨更多的是，在分子尺度上，病毒給我們對於生命的理解所帶來的衝擊。書中援引大量分子尺度上病毒研究的進展，藉以說明科學對於病毒的研究不斷更新着生命的概念本身。



生命或者「活着」本身即為一種隱喻，其內涵是流變的。而這一隱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因為它總是涉及對於既定秩序的挑戰。藉由病毒及其隱喻，作者提議我們應該重新想像「生命」以及「活着」的多元意涵，並最終抵達對於生命政治的再探討。

與細胞、自我與他者、合作與衝突、接納與排斥、利己與排他、免疫與增殖、利益與弊端之間的界限消融，而且在分子尺度上遠比我們以往設想的更加開放，例如一系列科學研究表明病毒感染細胞的過程，並不是「你死我活」，病毒不僅可能與宿主細胞合併，將其變成病毒工廠，病毒之間還可能發生合作、利他的行為（頁221-38）。在本體的意義上，信號與物質都並非涇渭分明。換句話說，物質可以是信號，而信號也可以是物質。更為重要的是，生命/非生命的界限和過渡，乃至生命在何種層次和規模上突生，也隨着分子生物學本身的演進而處於持續地被分辨的過程中。作者提出一個尚未解決的認知矛盾：生物學實體如病毒、基因，通常被認為是「沒有生命」的，或是「非有機體」，但是研究者無法不以「擬人」或「社會性」的理解來建立有關病毒的知識。而且，活的物質(living matter)與死的物質(dead matter)之間的區分，並非明確、固定不變的。科學家在上述病毒生物學以及尋找生命起源的研究中，不斷刷新擴充對生命的定義。因此，反過來看，生命或者「活着」本身即為一種隱喻，其內涵是流變的。而這一隱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因為它總是涉及「對於既定秩序的挑戰，包括世俗權威的，或宗教屬靈的秩序，比如自然和超自然之間、塵世和神明之間，乃至於正統和異常之間的界線」（頁42）。

總之，藉由病毒及其隱喻，作者大膽提議，我們應該重新想像「生命」以及「活着」的多元意涵，

並最終抵達對於生命政治的再探討。生態人類學經典民族志《森林如何思考：超越人類的人類學》(*How Forests Think: Toward an Anthropology beyond the Human*) 恰好展示了這種可能。森林是否可以思考，如何思考？人類學家科恩(Eduardo Kohn)以美洲叢林為例，說明了如果從語義和符號的角度來看，森林確實在進行着以符號為載體的意義表達、傳遞和沉積，因此，確實可見森林一直在進行思考。這種理解也涉及尺度的縮放和邊界的跨越：如果分析尺度和邊界不拘泥於人類個體或族群，而是放大到森林系統，在共時的維度上，可見不同物種如人—昆蟲—樹木、捕食者—被捕食者，都在進行着信號的交換和傳遞；而在歷時的維度上，遺傳表徵就是對於以往歷史思考的表達和沉澱。《森林如何思考》一書進而提出，如果森林能夠進行思考，並且正在進行思考，是否可以視為一種「活着」的思維？人類學家從語義、思維、物種關係與遺傳表達的角度，提供了一種重新理解「活着」的方式<sup>⑩</sup>。

而在新物質主義的脈絡中，對於物是「活」的這一點，早有諸多探討。在這一視角下，物不一定具有生命，也不一定需要具有意志、思維或主體性，但仍可具有活力。例如，班尼特(Jane Bennett)基於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能動之物」(actant)概念，提出「活力之物」(vibrant matter)。在其論述中，物之活力在於，它不一定是消極的、被動的、頑固的，為人所預料、計劃、控制的；相反，非人之物自有

其軌迹、偏好。它無疑具有施加影響、改變現實的效力，甚至常常以失控的、意外的方式影響着世界<sup>⑪</sup>。如果轉換一種人類中心主義（將自然世界看成是一個等級化的系統，而人位於中心主宰着自然事物）的視角，正視物的效力和能動性，這就把生態環境的視角帶入了社會研究的領域。筆者有關廢棄物的經驗研究也正是基於這一視角，呈現了「垃圾」這一人類生產、消費的副產品，如何以人類始料未及甚至是破壞性的方式，重新回到人類的社會生活中，在政治經濟領域皆構成重要影響<sup>⑫</sup>。

### 三 在人類世中，探索解殖政治

「人類世」是本書的核心概念，這一概念是由大氣化學家克魯岑（Paul J. Crutzen）和生物學家斯托默（Eugene F. Stoermer）在二十一世紀初提出的。一般而言，「人類世」指人類的活動對地球產生顯著影響的年代。這一概念試圖把人類的歷史與社會經濟活動嵌入到地球的地質年代當中考量，其具體起始時間尚無定論（頁63-64）。較之以往的人類社會歷史分期，這一概念的時空尺度非常大，除了時間維度拉長到地質年代之外，還把人類放置在地球的總體生態系統當中加以考量。它基於一系列跨學科的理論和研究，除了生態學，還基於熱力學、進化生物學、宇宙論和量子理論、複雜系統科學的諸多理論，並且以能量、物質、熵和進化的要

素，看待人類的活動。例如「熵」的概念，意指人類活動的熱量、能量、信息的總量，生命是依賴低熵的——它儲存了地球上支持人類和自然環境繁盛的能源，使得所有的生命成為可能，使得自動產生、遠未平衡的有機生命得以存續和繁衍。近年「人類世」概念的流行與人類所面臨的現實生態環境的挑戰密不可分：如物種豐富性的急劇降低、氣候變化的日漸加劇和不穩定化、正在發生的海洋的酸化、南極洲冰原的消融、自然多元性的持續喪失、不斷改變並不斷擴大的病毒載體，等等。這些問題都迫使人類重新思考自身在地球生態系統中的位置、處境和行動。

除了「人類世」以外，近年來被學界提出並廣泛探討的概念還有「資本世」（Capitalocene）、「生態世」（Ecocene）、「種植世」（Plantationocene）、「塑膠世」（Plasticene）、「病毒世」、「嶄新世」（Novacene），等等（頁70-71、93、184）。正如作者所言，時代的命名，涉及的是不同的價值和行動取向，也涉及邊界劃定的政治性。這些劃分基於不同的問題意識，是「從不同向度對社會所進行的症狀式閱讀」（頁107）。換句話說，指稱我們處於某「世」，暗含着對時代症候、關鍵矛盾乃至問題根源的認知，也暗含着對於相應解決方案的呼喚。例如，「資本世」強調的是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擴張帶來的一系列全球不平等問題，包括人類族群之間以及人類對於非人類的侵佔和剝奪。而「人類世」這一概念凸顯的則是一種地質學的意涵，是在行星

指稱我們處於某「世」，暗含着對時代症候乃至問題根源的認知，也暗含着對於相應解決方案的呼喚。「人類世」這一概念凸顯的是一種地質學的意涵，是在行星的視角下對於人類活動的總體認知，強調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地質和生態的影響。

「殖民」是本書所強調的另一核心概念。作者甚至提出「殖民世」的時代命名。「殖」不僅僅發生在人類族群之間，還發生在不同物種乃至人與非人之間。這揭示了人與物的連續性，人與非人所面臨的殖民也是共通的。

的視角下對於人類活動的總體認知，強調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地質和生態的影響，包括人類對地球的物質採掘和消耗（如化石能源），也包括人類向生態系統進行的各種排放（如碳排放）以及這些活動所產生的影響（如氣候變化、物種多樣性消滅），並呼喚我們關注這些影響，警示這些影響在未來持續累積而造成的不可逆效應。當然，在人類世框架下，也有從生態社會主義出發，強調資本主義造成了人類世諸多症候的論述<sup>⑬</sup>。

在諸多「××世」的命名當中，本書以「後殖民的人類世」為名。「殖民」是本書所強調的另一核心概念。作者甚至提出「殖民世」（Colonialocene/Coloniocene）的時代命名，指出「殖民世的問題意識……扣連了人類、資本、殖民、生態等多種面向的批判」（頁107）。之所以特別強調「殖民」的概念，是因為它不僅包含多重視角和意涵，還具有明確的倫理指向與政治性。在人類歷史上，顯著、大規模的「移殖」始自大航海時代，涉及人類、物種的遷移，以及對於所移之地的資源的徵用和佔取。從最初的「移」到愈來愈密集和暴力的「殖」，「殖」愈加具有一種負向的意涵，相關活動涉及一系列權力和不平等關係，包括侵略、佔領、掠奪、支配、壓迫、擠壓、宰制，等等。相應地，「解殖」則暗含着抵抗、轉化、解放的可能。作者所強調的「後殖民」，並不反對「殖」的原本意涵。毋寧說，「後殖民」是「殖民」概念的升級版本，即超越「殖民—非殖民」、「人一物」的簡單二元對立，觀察

不同行動主體在不同尺度、層次上所發生的「殖」。「殖」可能發生在生態層次上——生態系統並非天然和諧，衝突無處不在；也可能發生在分子和基因層次上——演化正是在移殖、防禦、抵抗、解構中持續發生。

「殖」不僅僅發生在人類族群之間，還發生在不同物種乃至人與非人之間。體認這一點相當關鍵。這揭示了人與物的連續性，人與非人所面臨的殖民也是共通的，而這種揭示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首先，人與物的區分界限是歷史性的，殖民的歷史很多時候正是體現在人類對於他者的「非人化」，即將其他人界定為「非人」，進而把擠壓和掠奪侵佔合理化。其次，在「殖」的運作上，資本政權對於人與非人的剝削不分軒輊，「人類對動物及自然的支配無一不複製到對人類的支配上，透過科技和操弄，人類協助完成了對自身的支配」（頁116）。因此，反過來看，解殖也應該是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是對於人/物的共同解放。

在「後殖民」意義上，解殖發生在人類族群之間，人與非人之間，不同物種之間，達至在行星上的共生、共處。這一美好圖景即政治生態學所追求的生態正義。在近年有關人類世的論述中，提倡一種倫理的重建。簡言之，這種倫理的基礎在於，首先認識到人類是嵌入於，而不是外在於生物、物理系統中的。這一論述的幾個核心概念包括「蓋婭/行星」、「居所」、「共同體」、「成員/成員資格」等<sup>⑭</sup>。「蓋婭假說」於1960年代由英國科學

家洛夫洛克 (James E. Lovelock) 提出，即地球是一個可以自我調節的有機體，生命體與自然環境之間存在複雜的相互作用。「蓋婭/行星」意指以星球的尺度來看待人類活動及其後果，並且強調人類作為生態系統中的一員。地球是人類的居所，即棲息之地，也很可能只是暫棲之地。人類與其他物種同屬於一個行星的共同體當中。人類作為共同體中的成員，既不是中心，也並不屬於「例外」。

當然，解殖政治的願景及其相關倫理的主張，還需要具體的理論論述作為支撐。如何在本體和認識論上超越「人類中心主義」或「人類例外論」？要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正如作者所言，（部分）人類已在「中心」的位置上以當前的方式獲益多年，既得利益盤根錯節（頁131）。不過，更重要的是，人類要轉換認識，意識到自身存在的「多物種性」並非易事。這又回到了本書所反覆強調並援引大量科學研究實例所試圖提出的對於物種、生命本身的再理解。換句話說，需要重建的思考是，人何以為人？在生物、細胞、進化、神經、身體意義上，物種又何以構成？差異的遴選、界限的劃分、模型的建立，在歷史上又是如何展開的？作者提醒我們，不要忘記在外部看來是「固定」的物種，其實在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研究當中是不斷被推翻、更新、重建的。所謂生物學定義的物種，可能會讓人誤以為這是生物學內部公認的定義；事實上，物種作為一個「單數的『行動者』」是很難成立的，「不妨將各種

不同的物種定義視為差異化的認知機器」（頁135-37）。因此，「要釐清一個更具批判力與生態思考的『社會』意象」，就需要關注加入物種向度的「延伸交織性」（extended intersectionality，頁62）。面對諸多未完成的科學研究和不斷浮現的最新例證，唯有保持持續的警覺與開放，才可摒除人類例外論。

這似乎是一個無解的悖謬之題。作為人類，如果我們承認自己是行星生態、生物化學系統的一部分，不僅不是中心、例外，甚至只是特定時空中的動態演化之暫時組合，那麼我們對於世界的認識就不可能超越自身，不帶有偏見和局限性。誠如作者所指，「我們身而為『人』，儘管充滿許多混雜和嵌合，但承載着特定演化歷史的生命形式，必然以其體現觀點的偏誤去觀察這個世界，乃至於宇宙」（頁186-87）。對此，作者也提醒我們，如果執著於這一理解，又會落入人類理性與邏輯的思維陷阱，特別是理性和行動的二元：我們往往認為，行動總是基於理性，只有在理性上理解，才能在行動上加以照護。事實上，理性和照護的踐行並非按部就班，照護不排斥甚至包含着理性的思考，但照護本身是遠遠超出理性和邏輯的。體感和情緒，也都是照護的關鍵要素。因而，作者提倡以一種「情動」（affective）的方式思考蓋婭的政治，亦即重視情緒、直觀、感受的力量，懸置理性和情感的對立，「感受一下在所謂的智能、直觀、臆想、情感和肉身之間的分

「蓋婭/行星」意指以星球的尺度來看待人類活動及其後果，並且強調人類作為生態系統中的一員，既不是中心，也並不屬於「例外」。作者提倡以一種「情動」的方式思考蓋婭的政治。

子連續動態」，「在感受中理解，在理解中感受」（頁189、190）。



## 四 重啟生命想像的持續挑戰

本文試圖以「概念叢」的方式進入《後殖民的人類世》的思想世界。本書的每一個章節，皆以一首搖滾音樂的歌詞作為開篇，令讀者感受到作者的用心。從文字到音樂，作者呼喚跨越語言的屏障和思維的藩籬，重新觀看我們的世界與萬物。誠如作者在〈後記〉所言，本書採用的寫作方式，是為了抵達一種更加自由的思考（頁239-40）。

本書集成了近年後人文主義、新物質主義、本體論轉向、政治生態學思潮的一系列思想和理論資源。這些思潮各有側重的框架、議題和理論脈絡，但都試圖超越人文社會科學既有的認識框架，如「自然—社會」、「科學—人文」、「主體—客體」、「人類—物/非人」、「男性—女性」等一系列基於啟蒙理性的本體觀念而形成的二元對立。這些思潮並非標新立異，或僅僅受到理論創新的驅動而產生。它們基於對當今全球面臨諸多危機的深刻體認——舊有的認知框架無助於我們理解當下世界組合了「自然/社會」、「人/非人」、「科技/人文」的複雜現象，如全球人畜共患疫病、能源與糧食短缺、生態危機等，更無助於對這些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在這一脈絡下，本書以重新理解生命以及新的生命政治為切入點進行了探索，並以此回應後人類的諸多思想命題。

然而，本書仍有未能充分探討、尚需繼續推進之處。首先，作為一部自由思考、頗具開放性的作

品，本書極富啟示性。不過，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來說，作者的呼喚如何實現到研究當中，如何將這些理論和思想資源應用於各個領域的研究，具體的路徑仍然不甚明確。換句話說，視角的轉換和實際的操演之間仍有鴻溝需要橋接，要在具體的學科領域內達到範式轉型，中間還需要更多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工作。

其次，作者為了論證其生命觀念，援引了大量的科學研究作為例證，例如以病毒學的一系列研究為例探討何謂生命。這既是本書的迷人之處和貢獻所在，也遺留了諸多未解的思維謎題。第一，作者為甚麼較多援引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等學科，而相對較少援用其他可能幫助思索生命之意涵的學科，如生物醫學、物理學、計算機科學、認知科學與神經網絡的相關研究？這是否會帶來某種視角的偏移或局限？第二，作者何以採取某學科/某個研究作為例證，是否有研究品質、價值的考量或某種標準的設定？（對於筆者而言，科學是複數的、非中性的）抑或，具體選取某一研究及其結論而非另一研究，對於作者的論述來說並無實質差別？當然，更重要的問題是，人文社會科學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可以藉由自然科學研究的知識成果來理解世界？或者說，科學研究在何種意義上/多大程度上可以構成人文社會科學論證的基礎？這種論證方法是否未能闡明自然科學作為人類認識物質世界的其中一種方式，其本身也是需要加以解析、反思和批判的？自然科學知識的生產，本身是

本書集成了近年後人文主義、新物質主義、本體論轉向、政治生態學思潮的一系列思想和理論資源。不過，如何將這些理論和思想資源應用於各個領域的研究，中間還需要更多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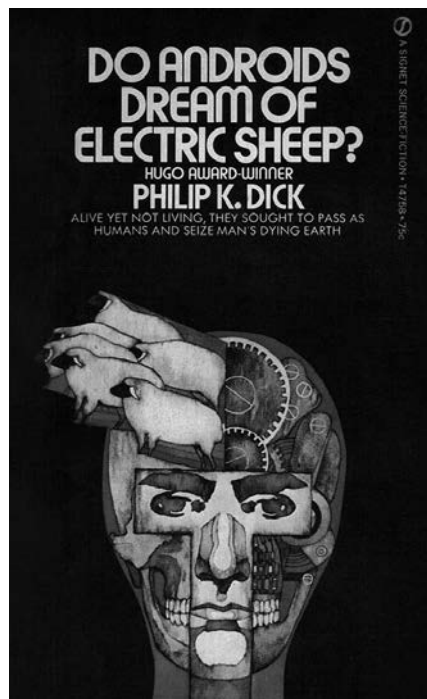
建立在人類特定的認知方式和觀念基礎上的，而議題的設置和研究的開展無不處於現實的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結構當中，因而並沒有絕對純淨，不被政治、社會、文化、資本「污染」的科學生產之場所。

在「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 或「科學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的脈絡下<sup>⑤</sup>，借助科技史、以實驗室為田野的民族志等研究，人文社會科學得以打開自然科學的「黑箱」，分析科學知識的製造實踐，科學真理的生產，科學權威的塑造，科學共同體的建立，科技爭議，以及科學家、工程師、專家、科技官僚身份等系列命題。如果僅僅把新的自然科學研究結果作為簡單的例證，那麼就棄置了STS的思想和方法資源，而把科技知識本身本質化了。對於科學可以告訴我們

甚麼，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告訴我們，還需要更加審慎的思辨。

最後，談及生命，不能忽視的是電腦科學和通訊技術發展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影響，特別是近年來突飛猛進的元宇宙 (metaverse) 和人工智能 (AI) 等技術。元宇宙、虛擬實境 (VR)、腦機介面 (BCI) 等技術提供了新的感官體驗和具身性，重塑肉身與感官、時間與空間、人與人之連接，也重新界定了虛擬與現實及其邊界。AI 技術則提醒我們重新審視意識、思維、語言、情感。「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sup>⑥</sup> 已經是大眾流行文化的重要表達。未來已然逼近，數字技術如何幫助我們重新理解生命，乃至重塑生命本身？如果要探索生命政治，這無疑是需要探究的重要命題。

談及生命，不能忽視的是電腦科學和通訊技術發展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影響。元宇宙、虛擬實境、腦機介面等技術提供了新的感官體驗和具身性，AI 技術則提醒我們重新審視意識、思維、語言、情感。



在關於AI的討論中，美國科幻作家迪克 (Philip K. Dick) 1968年出版的小說《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標題常常被引用。(資料圖片)

## 註釋

① 後人文主義有時也譯作「後人類主義」，興起於二十世紀末各類環境運動之後，批判並反思以人類中心主義、「自然—文化」、「主體—客體」、「身體—心智」等二元論為特徵的傳統的人文主義，認為人類與非人類的界限是動態建構的，人類與非人類、技術是交互共同進化的。參見 Cary Wolfe, *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② 作為近十餘年在歐美興起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潮流，新物質主義試圖超越以往只聚焦人類的社會分析，不再將人作為研究中心，而將「非人之物」(non-human)——包括動植物、自然、技術、物品等有生命和無生命的非人之存在——作為研究對象，重新闡釋人、物、科技和自然

環境的關係。參見Rick Dolphijn and Iris van der Tuin, *New Materialism: Interviews and Cartographies* (Ann Arbor, MI: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2); Nick J. Fox and Pam Alldred, *Sociology and the New Materialism: Theory, Research, Action* (London: Sage, 2017)。

③ 本體論轉向是二十一世紀以來在全球範圍出現的一種人類學思潮，強調超越主客體二元對立，關注生態、自然、環境、物質、空間及人造物等在文化生產中的重要作用。可參見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拉圖爾(Bruno Latour)、基恩(Webb Keane)等代表學者的著作。

④ 作為生態學與政治學的交叉學科，政治生態學自二十世紀興起並發展，強調生態環境現象的社會、文化、政治屬性，提倡對於環境議題的跨學科研究。參見Paul Robbins, *Political Ecolog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Bruno Latour,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⑤ 參見張君玖：《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欲望》(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2)；《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6)。

⑥ Michèle Lamont and Virág Molnár, "The Study of Boundar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8 (2002): 167-95.

⑦ Lyle Fearnley, "Wild Goose Chase: The Displacement of Influenza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Poyang Lake, China", *Cultural Anthropology* 30, no. 1 (2015): 12-35.

⑧ Katherine A. Mason, *Infectious Change: Reinventing Chinese Public Health after an Epidemi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⑨ 凱克(Frédéric Keck)著，錢楚譯：《病毒博物館：中國觀鳥者、病毒獵人和生命邊界上的健康哨兵》(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

⑩ Eduardo Kohn, *How Forests Think: Toward an Anthropology beyond the Huma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⑪ 參見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⑫ 張劼穎：《垃圾之戰：廢棄物的綠色治理、科技爭議與環保行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

⑬ 齋藤幸平著，王盈譯：《人類世的「資本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

⑭ 布朗(Peter G. Brown)、蒂默曼(Peter Timmerman)編，夏循祥等譯：《人類世的生態經濟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3)，頁77-103。

⑮ STS旨在研究科學、技術與社會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特別關注三者互相建構、共同生產的過程。STS研究自1990年代興起，是一個跨越哲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傳播學、文化研究等多學科的交叉領域。其研究議題包括但不限於科學史、生態環境、生命健康、科學技術、數據、公共政策、傳播與媒介。

⑯ 出自美國科幻作家迪克(Philip K. Dick)1968年出版的小說《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講述人類奴役和對抗仿生人的故事。在之後關於AI是否有自主意識、人類本質、虛擬現實等討論中，該標題常常被引用。